

古代方志文存的内容及价值

——以重庆地区古代方志为中心

段 庸 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古代方志文存是指古代方志中的文学书写,是方志的“文学存在”。从内容角度而言,包括艺文志、人物纪传、轶事(方外)以及舆图、沿革中的故事性描写;从文献角度而言,具有发现新材料、形成学术新增长的文献价值;从文学角度而言,具有地域文学识别、凸显地域文化的价值。整理研究古代方志文存可以唤醒文学地域记忆,寻根民族文化基因。

关键词:古代方志;文存;价值;重庆地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1-0070-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107

所谓古代方志,是指民国(包括民国)以前的地方志。所谓文存,从文献角度说,方志的所有内容都是文存。从文学角度说,则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即黑格尔所说的具有“艺术美”的作品。具体而言,包括方志中的艺文志、人物纪传、轶事(方外)以及舆图、沿革中的故事性描写。但作为志书文献,文存以后者为主,也会兼及前者。

近年来,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颁布后,从全国到地方,更加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2018年10月,国家图书馆在《广州大典》中心召开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学术会,大力提倡对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古代方志是其中重要内容。目前,就方志文献整理研究而言,一是对方志编目和提要,比如《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二是对方志文献的利用,如广州大典中心编写的《广州大典》对志书文献的利用,以及各省市编写的地方文丛,多注意对志书文献的利用;三是整理出版,主要是地方政府对某一部志书的整理出版,采用校勘、句读,让馆藏志书与读者见面,比如重庆江津区对乾隆版《江津县志》的校勘整理出版等。另有文人个案研究涉及到志书查阅和征引,比如王士禛研究,因王士禛曾经两次入蜀,其相关事迹在所历地方有志书文献可征,于是查阅相关志书来丰富和深入研究,其他文人个案多类此。

类似以上研究,以整理出版和文献征引为主。针对方志中的文存,从文学角度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则较少。本文从古代方志中的文学书写考察方志的“文学存在”,以重庆古代地方志为中心,探讨古代方志文存的内容和价值。

收稿日期:2020-05-11

作者简介:段庸生(1965—),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文献学、地域文学。

基金项目: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地区古代方志文存整理研究”(2015YBCB056)。

一、古代方志文存的内容

(一)古代方志中的艺文志

古代方志中的艺文志本身就是保存直接与文学相关的作品,是方志文存的重点部分。“艺文志”始于班固《汉书》,将图书典籍汇编成目录,辅以辑略与卷帙。这种做法,在古代地方志的“艺文志”也得到了沿用。万历、道光《重庆府志》的“艺文志”就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别录入作者、书目及卷帙。如在“经部”就收录《周易》及“四书五经”方面的文人著作。

古代方志“艺文志”中另一个内容是编辑收录的诗文辞赋作家作品。考察这部分作品,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是作品描写了本土人物风情,但作家既非本土人士,也没有来过此土,只是作品内容与此土有关。

比如在康熙、光绪时期的《巫山县志》中都收录了部分以《巫山高》《巫山一段云》题咏巫山(尤其是巫山十二峰)的作品。光绪《巫山县志》卷三十二“艺文”收录从五代以来用《巫山高》题咏“巫山”的诗歌63首(其中巫山十二峰23首)。其中作者并不一定来过巫山地区,但诗词所咏又与巫山有关。比如(梁)元帝《巫山高》、(陈)后主《巫山高》等,其实难有资料显示二人亲历了巫山。

方志收入这样的作品,除了作品内容与此土有关外,主要是矜美乡邦。比如光绪《巫山县志》“艺文”收录元代赵孟頫《巫山十二峰》(调巫山一段云),又在该志“古迹志”中说:“赵文敏手书十二峰词,昔刻于巫山。县令厌其求索之烦,磨去,仅于士大夫家见之。”意即赵孟頫不仅来过巫山,还亲手把自己的题咏镌刻在巫山十二峰,几乎坐实了赵孟頫的巫山游历。其实可以想象,巫山十二峰何其险峻广袤,就是今天巫山十二峰也很难一一登临,何况元代的赵孟頫!之所以如此,矜美乡邦的意图一目了然。

二是因仕宦、贬谪、游历等原因,流寓来此,有感于斯土人物风情,感发为诗文词作。

比如唐代文人刘禹锡因八司马事件而贬官远州,长庆元年(821)冬,改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夏,调任和州。在不到四年时间的夔州生涯中,刘禹锡创作了50首夔州诗,而且收集整理并雅化创作《竹枝词》,使《竹枝词》从民间口头走向文人创作,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奇葩。

比如白居易元和十三年(818)从江州(江西九江)量移为忠州(重庆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夏就奉诏回京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宦海失意的白居易在此期间创作的诗文也许在其整个诗文中占不了多少数量,但白居易的忠州经历成为他一生记忆最深的刻痕,忠州成为白居易魂牵梦绕的地方。研究白居易的资料显示,白居易诗歌中与忠州有关的作品不少于百首。不仅如此,白居易治理忠州,其流风善政,传之后世。明朝崇祯年间,在忠州知州马易从的倡议下,建成祭祀白居易的白公祠,期望“后之君子,从而恢拓之,与巴山蜀水共长也”。

唐代李白、杜甫等和宋代三苏等游历三峡一带,写下了独具特色的作品。有的作家甚至风格为之改变。清代王士禛继钱谦益后主盟清代诗坛数十年,倡导“神韵说”,仕途游历中两次旅蜀,踏足渝州、涂山、瞿唐三峡、巫山十二峰等巴渝形胜,写下了大量描写题咏自然风物及怀古感时之作。得山川形胜之助,诗文格调激越,气韵沉健,改变了“兴到神会”的“神韵”,展现了王士禛诗文风格之变化。

类似上述的文人经历及其作品,均可见之于诸如道光《重庆府志》、道光《夔州府志》、同治《直隶忠州志》、光绪《巫山县志》等的“艺文志”中。他们的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此土的风物人情之美,而且表现了文人在一个特殊时段的心路历程,甚至成为人生历程中最靓丽的篇章。

三是本土文人作品。这部分作家生于此土,成长于此土,因而其文其诗,无不表达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以重庆地区古代方志所见为例,以记载明清两代本土文人为主,在道光《重庆府志》“艺文志”中,记

载了清代的傅作楫、龙为霖、刘慈、周开封、王恕、周煌、李天英、张乃孚、王清远、龚有融、王汝璧、李惺、程伯璠、胡超等为数较多的本土诗人,以及小说评点家冯镇峦,他们为清代文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文学活动使地域特色更为明显,理论成果也更为突出,成为清代文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标志着重庆古代文学由流寓文人创作为主导,转变为以本土文人创作为主导。

此外,尚有“不著名”的本土文人诗文作品见于古代方志“艺文志”。因为“不著名”,所以问津者少。但这一部分诗文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有难得之作。

比如乾隆《江津县志》“艺文志”中当地举人夏泽所写《黄石龙记》:

江以石为险,其初委蛇曲折,不得已而侧击横冲,跳梁越背,石之垒叠益多,水之汹涌益甚,其势然也。水以夏秋为盛,冬春流涸,溪山澄静,磧既平而可登,石亦远而皆见。至于大雨时行溪谷,尽满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狂澜怒而不可测,飞涛卷而不能越,峡闭谷封,斯瞿塘不敢上下之时矣。惟黄石龙则不然,石龙自江中直起,长脊高背可数十丈,绵亘逶迤,俨若游龙,故名石龙,色黄而赤,兼之壤土漾沙,时或积之,恍如鳞甲,故又名黄石龙。然而顺流偃卧,不与水争,故不以石为险,当夏秋泛滥之际,水高出其上,两岸皆平,荡然空际,波浪不惊,是以水盈不盛。至水涸之际,沙磧在左岩壁处,右凡舟自上而下,远望峭壁,恐舟之撞崖也,急挽舟而北,顺石龙以下,稍出浅横流,必入磧上,细石成群,乱流冲击,舟横而侧顷之,沙石皆动,积与舡平,舟斯溺矣。故冬春之交,十必没六七,其险非石龙为之,畏岩壁而左行,陷于磧上,搁浅之所致也,舟入其中,势必拆坏。两岸居人熟知其故,恒驾小舟于下,一遇舟坏,便群争打捞索救,竞拾覆舟之客,横立逆流,号呼不已,此方之人,岁以为利。

比如在康熙《长寿县志》中收录署名雪庵的诗歌《谢某馈柑》:

弃却春光独爱秋,至今不改皱眉头。主人若把金刀剖,点点酸辛对客流。

这一部分作家因其“不著名”,在常规文学史中几乎难见踪影,这些作品,也因其“不著名”,几乎无人问津。但他们又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需要披沙拣金,逐一梳理,然后焕发光彩。

(二) 古代方志中的人物纪传

考察古代方志中的人物纪传,多与本地有关:或是本地人士,或是流寓来土。“著名”人士多征于史书(正史),而不见于史书的本土人物,则志书立传。

征于史书者,或精简史书内容,构成人物传略。比如道光《重庆府志》中尹珍、李永事迹采自《后汉书》本传,董和、董允事迹采自《三国志》本传,度正、余玠事迹采自《宋史》本传,邹智、江渊事迹采自《明史》本传,等等。

于史书不见的地方名人,则主要采自其他志书,或综合他书内容。比如:《重庆府志》中毛楚事迹采自《华阳国志》,李阳冰事迹采自《一统志》,税安礼事迹采自《巴县志》,王璋事迹采自《贵州通志》,等等。

也有地方名人事迹采自文人相关著作,比如冯时行事迹,采自王应熊撰《冯时行传》,江朝宗事迹采自蒋云汉《文稿》,等等。

之所以说方志人物纪传属于文存,是因为方志人物纪传仍然采用了史传人物的方法“以事传人”,人物事迹具有传奇性,人物故事具有情节性,有的甚至有较为生动的细节描绘。比如民国《合川县志》中的“余玠”:

……玠大更敝政,遴选守宰,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如帅府。下令曰:“有谋以告我者,以礼接之,高爵厚禄,朝廷不吝,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诣玠上谒,玠宾馆之。旬日语玠曰:“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玠大喜曰:“此玠志也。”密

以其谋闻于朝,且请官之。诏以璉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遂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敝,以三千骑至云顶山下,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闭关不纳。又属丞相谢方叔家子侄结方叔为援。求玠之短……

纪传中“密以其谋”“玠大喜”及“求玠之短”等细节描写,使余玠这个历史人物具有了小说人物形象的艺术特征。

再比如道光《夔州府志》中的“鲍陋”引入传说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

鲍陋镇白帝城,为谿道福所围。城中无水,凿石开渠以汲。道福不悟,谓陋渴欲降之。陋令人于江侧得生鱼遗道福,乃解围去,民赖保障,今疏凿之迹尚存。

谿道福想以断水困死鲍陋,鲍陋凿石开渠汲水,并以鲜鱼送道福,乃解围困。鲜鱼的细节描写充满了生动性和机趣性,这正是刘熙载所倡导的史传文学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

(三)古代方志中的轶事

古代方志中的轶事类似于中国古小说中的“志怪”与“志人”。直接记录为“轶事”或者“方外”;也有记录为“仙释”“祥异”或“异闻”等。还有在艺文志中采用“补编”的形式记录。比如康熙《长寿县志》所见“忠孝”“隐逸”“仙释”;乾隆《江津县志》中“艺文志补”等。

从方志所见轶事题材分类看,可表述为:人物轶事、风物轶事。

人物轶事,即人物的民间故事存在,有历史名人,有市井百姓。

比如历史名人秦良玉在道光《石柱直隶厅志》中有别于《明史》本传的轶事传说;著名理学家程颐在道光《夔州府志》中有关去涪州的“异闻”等。这些“名人轶事”体现了重庆地区对历史名人的民间认同。

“百姓轶事”即市井人物在民间的故事存在。如光绪《綦江县志》关于孝妇的故事、民国《合川县志》关于罗生慈善的故事等。这些“百姓轶事”体现了重庆地区古代人的精神风貌。

“风物轶事”是关于重庆古代自然万象的故事,如康熙《长寿县志》关于天降陨石的故事、道光《重庆府志》关于长江水变的故事、光绪《垫江县志》关于盐泉化血的故事等,这些故事体现了重庆地区古代的山川、风物、民俗。

比如《太平广记》卷401引《北梦琐言》有一则轶事,警示贪欲: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竞于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堂,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骇入验之,乃无延燃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篋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

这些轶事内容实则就是纪昀《四库总目提要》所称的寓劝诫、资考证、广见闻的文存。

此外,重庆古代方志中记载重庆地区沿革、輿地等类目中也有叙述輿地、沿革历史变迁的故事性作品。

比如康熙《长寿县志》在“建置沿革”中记载:

明始置长寿县,《蜀中广记》云:县有长寿山,以人多寿考,故名。

在“建置沿革·山川”中记载“乐温山”:

乐温山下有乐温滩,在县南四十里,元时置涪陵巡检司,因唐县址也。地气常温,禾稼早熟,因之得名。志以此山人多耆考,亦名长寿山。

其实,稽考“长寿县”之得名,可征者,元末明玉珍及其子据蜀,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以“县北有长寿山,居其下者,人多寿考”为据,将唐朝乐温县改名长寿县。由于山下人长寿,遂有“长寿山”,由于

有长寿山,遂有“长寿县”。人之“长寿”遂与地名“长寿”关联在一起了。而长寿县的人何以长寿,民国《长寿县志》称其乃民风纯朴所致:“邑名长寿,以县东北长寿山得名。宣尼有言:‘仁者乃寿。’我邑民风素称纯朴,今非曩昔,顾名思义,是可鉴矣。”

由于有乐温滩而成为乐温县,再到有长寿山而成为长寿县,一个简单的地名沿革,具有了丰富的人情色彩和人文思想——人们之所以长寿,因为此地温润,物产富饶,丰衣足食;还因为此地民风淳朴,仁者乃寿。

再比如,在“建置沿革·山川”中记载“不语滩”:

不语滩,(长寿县)治东八里。相传客船过此,皆相戒不语,言则滩加汹涌。

民国《长寿县志》对此进一步丰富:

张飞滩,在长寿县,一名不语滩。凡舟过此,必悄然而下,则安澜无恙。若一声张,则水必狂激涡漩矣。

方志中的“不语滩”通过拟人化的文学手段,让一个简单地名具有了趣味性和传奇性。

仙女洞,(长寿县)治西九十里。旧传有仙女栖此,人或闻笑语声,其形卒不可得而见也。

仙女洞是因为有仙女住过,所以得名。引入民间传说,同样增加了地名的趣味性和传奇性。

类似于这样的舆地沿革叙述,征之于重庆其他区县方志,比如道光《夔州府志》、同治《直隶忠州志》等也比较多见。

这样的文存,从舆地沿革而言,是叙述历史变迁。从地域文化而言,带有趣味性的叙述,不仅增加了历史的传奇性,也增加了舆地的人文性。从文学角度而言,还具有胡应麟所论“粗陈梗概”的古小说特征。

二、古代方志文存的价值

对于古代方志的价值,古今多有持论。比如刘知几、章学诚、纪昀等所论风教、史补价值,今人所论考察、资政价值,等等。持论角度不同,大抵不出资政治、询民情、观风俗、补历史等方面。较少论及或不深入论及文学的价值。下面从方志文存角度,谈谈方志的文学价值。

(一) 文学研究的增长价值

方志文存是“沉睡的文学”,唤醒文学文献,是古代文献的“考古发掘”,可以发现新的文学文献,形成新的研究。

以重庆地区古代方志文存为例,整理研究,至少有三个新的研究增长:

一是能发现重庆本土作家作品,增加新的研究内容。比如道光《夔州府志》中的傅作楫、乾隆《酉阳直隶州志》中的土家族文人冉崇文、民国《巴县志》中的王尔鉴,等等。这些作家作品个性鲜明,数量大,现有文学史中几乎不及,存于方志文存中,具有地域文化识别的作用,对其进行整理研究,是“崭新”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新贡献。

二是能发现流寓来重庆地区的作家作品,可加强对这些作家的深入论述与阐释。比如道光《夔州府志》所见刘禹锡诗文,所见白居易诗文,乃至杜甫、李白、三苏诗文等等。志书所见新的文献发现,记录了这些大家在该地区一个时段的心路历程,浸润着地域文化气息,对这些特定时段作品的整理研究,是对这些作家研究的深入与丰富,可以发现新的文献,形成新的突破。

三是古代方志文存中的大量轶事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历史、风物、宗教、民俗等,比如重庆古代方志中关于禹娶涂山的传说、关于建文帝的传说,关于诸葛亮崇拜的传说,等等。这些轶事是用地区故事讲好地区文化的“活化石”,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是阐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

新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贡献。

另外,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学术史料,有助于作家作品的深度研究。

比如道光《重庆府志》集部《远村诗文集十八卷》录有王梦庚作的《序》,它处难见,极为难得。王梦庚,金华人,嘉庆癸酉拔贡,做官渝州,与冯远村诗文酬唱,从其序中可以窥见巴渝文人的交游状况,并且,从至交好友的角度为其诗文集作序,更能准确传递出冯远村诗文的思想内容与风格特征,是后人进一步研究冯镇峦诗文的珍贵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有个传统说法:艺文志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今天古代文学研究普遍面临着困扰和突破时,去唤醒沉睡的志书文存,尤其是方志中的“艺文志”,形成新的研究,是一种好的尝试。

(二)凸显地域文化的价值

地域文化的核心要义是不同区域具有鲜明特征的个性文化。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是文学与地理互动,是作家对地域的“地理感知”“地理记忆”“地理思维”。方志中的文存其实就是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文学,属于地方记忆与民族记忆。内容涉及到舆地变迁、历史事件、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赋税民俗等,就是刘知几所谓“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1]360}。“志其本国”“明此一方”,实则通过地理思维建立认同与归属,也就是建立文化自信。

以重庆所提倡的“巴渝文化”为例。从地理而言,“巴渝”的范畴应按照《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所称:“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2]5}其大略应当是东面接壤今奉节、巫山及鄂西一带,西面接壤今四川宜宾、泸州一带,北面接壤大巴山脉一带,南面接壤乌江流域、贵州省部分区域。重庆刚刚处于核心区域,所以,直辖之后大力提倡巴渝文化。巴渝文化作为后发概念,过去与巴蜀文化、巴楚文化关系紧密,近年经过研究,其地理范畴、文化内涵及其学理性逐步明晰,也得到学界逐步认同。但是,其文化个性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有关论述和阐释多是从概念到概念,不多的材料实证,其可信度总是在质疑中。

如果从该区域的方志文存去进行研究,则会发现相对原生态的巴渝古代历史沿革、地理山川、风物人情等呈现出的地域生态特征和文化标签。

比如,如果我们从民俗角度考察巴渝文化个性,可在方志中见到这样的记载:

刚悍生其力,风谣尚其武。奋之则寘旅,玩之则渝舞。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

人多秀异,喜以诗书自娱。

如果我们从风景角度考察巴渝文化个性,可在方志中见到这样的记载:

此地:其趣在月露风云之外,其秀孕高深人物之奇,登临俯仰,别有会心…空灵飘森,在有象于无象之间,最称奇妙。别具幽趣,空灵不着色相。(民国《巴县志》“艺文”)

比如乾隆《长寿县志》所记的夔州贡米等;康熙《江津县志》所记江津“八景”诗等;道光《重庆府志》、民国《巴县志》所记“巴渝十二景”诗等。如今“洪崖滴翠”“字水宵灯”“黄葛晚渡”等景观,已成为今天网红打卡地,这正是文化自信的活态体现。

如果我们从物产角度考察巴渝文化个性,可在方志中见到这样的记载:

巴地盐泉

巴乡清酒

巫山神药

长寿丹砂

夔州贡米

涪陵荔枝

……

如果我们从学术角度考察巴渝文化个性,可在方志中见到这样的记载:

《周易注》晋蜀才撰,十卷

《易传》譙定撰,无卷数

《易解》罗志冲撰,无卷数

《易论》冯时行撰,三卷

《存斋易说》阳枋撰,无卷数

《易注》蔺希夔著,无卷数

《大易统要》刘时俊撰,无卷数

《周易辨疑》李开先撰,无卷数

《周易辑要》余光著,无卷数

《五经注》郭明郁撰,无卷数

《五经文字》黄之玖著,无卷数

《五经辑要》潘治撰,无卷数

《四书启蒙》夏铭撰,无卷数

《四书讲语》龚懋熙著,无卷数

《四书集旨》袁凤彩撰,六卷

《四书汇解》简上撰,无卷数

(以上见道光《重庆府志·艺文志》)

常说蜀出相,巴出将。似乎蜀地出文人,有文学文化,巴地则出武将,缺少文人(尤其知名文人),文学与文化相对较弱,使得“巴渝文化”在文人文学方面自信心不足。其实,只要我们认真梳理相关方志,从道光《重庆府志》经史子集四部看,不仅录存了本土大量文人的诗文卷帙,而且在经部中录存了研究《周易》及四书五经方面的大量学术著作,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此土有大量文人文学,而且有深厚的学术思想。

征于古代方志文存,巴渝的民俗是独特的,巴渝的物产是独特的,巴渝的地貌是独特的,乃至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等等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都得益于方志文存的贡献。

古代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献,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宋代至民国时期存世的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在中国浩瀚的古籍中约占十分之一。^[3]其中的文存则是地域文学文献,大部分处于唤醒和等待状态。今天大力提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理方志文存,唤醒地域记忆,就是找寻民族文化基因,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参 考 文 献]

[1] 刘知几. 史通笺注[M]. 张振珮,笺注.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2] 常璩.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任乃强,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中国科学院.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本文所引用方志原文皆出于199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因是影印,未能一一标注页码。)

The Content and Value of Ancient Local Records

—Taking the Ancient Local Records of Chongqing as the Center

Duan Yo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Business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ancient local records refers to the literary writing in ancient local records, which is the "literary existence" of local rec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it has the value of discovering new materials and forming new acade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it has the value of regional literature identific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regional culture. Sorting out and studying the ancient local records is to awaken the regional memory of literature and search for the root of national culture gene.

Keywords: ancient local records; literary existence; value; Chongqing area

[责任编辑:陈忻]